荆楚巫风与日本古俗

陈 建 宪

荆楚地区位于中国长江中游，是楚文化的发祥地，素以巫风盛行著称。令人惊奇的是，远隔重洋的日本，其古俗与荆楚巫风竟有不少十分相似！这种跨越了巨大时空距离的相似，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二者之间有无渊源关系呢？下面就是笔者的一些初步探索与思考。

一、招魂、跳丧及其它

为了说明荆楚巫风与日本古俗之相似，我们首先将一些富有特色的荆楚信仰民俗，与日本类似风俗进行对比。

1、招魂　在荆楚地区，过去流行一种“叫活魂”的风俗。小孩在野地玩耍回家后，有时头痛脑热、发烧，甚至说胡话、昏迷不醒，家里人就认为他是把“魂”丢在野地了。于是大人就会拿一件孩子穿过的衣服，到他玩的地方“招魂”。他喊着孩子的名字，从孩子玩过的地方依次喊到自家大门口。进门后，吩咐人在水缸里以水杓舀动水，并大喊孩子的名字：“×××，回来哟！”然后将衣服罩在孩子身上，认为这样孩子的“魂”就回来了。日本也有类似的风俗。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曾描述：“在冲绳为孩子招魂是带着孩子穿的衣服，和巫女一起到孩子掉魂的地方问一声‘魂儿何在’，然后用衣服一包，带回去给孩子穿上。”我国学者马兴国先生也描述过日本这类风俗：“日本是将受惊吓的孩子放在石臼里，手挥水杓，嘴念咒语来招魂。在埼玉县，当孩子们在麦浪时戏耍，不见身影时，人们举着簸箕呼唤孩子的名字，这样，孩子就不会丢失。”两地“招魂”风俗，从衣服、水杓到叫喊等细节皆惊人一致。

除叫“活魂”外，日本还有不少关于儿童的迷信与荆楚相似，如孕妇禁吃兔肉，以免孩子生兔唇；新生儿“洗三”、抓周；小儿换乳牙时，将下牙扔上房顶，上牙扔床下（日本是扔廊下）等。尤有意思的是“认义父”风俗，《日本考》载：“若生男女之初，必密请一友认为义父。如不从，强求之”。荆楚地区流行的“拜干爷”，与这个风俗非常相似。

2、崇巫　荆楚地区古来盛行“巫风”，《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其开国之君熊绎，就是一个“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的大巫。楚人遇事皆通过巫觋而求教于鬼神，甚至挑选王位继承人和军队统帅这样的大事，也采用“枚卜”之法，即由候选人依次行卜，得吉兆者当选。在屈原的楚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包括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司命、风伯、雨师、山鬼等在内的鬼神世界。

在日本，古代也盛行巫卜活动。《魏志·倭人传》载，倭人有遇事灼骨而卜的风俗。其中提到一个名叫卑弥呼的女王，说她“事鬼道，能惑众”，显然是一个女巫。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仍有女巫活动。关敬吾说：“巫婆，战前曾被警方取缔，而最近又开始自由活动，公开占卜。不少人竟也凭信他们的预言行事。宫座的神主，有时也搞类似巫女的预言。”

3、丧葬歌舞　日本丧葬风俗有不少与荆楚地区相似。例如死者临终时，家属要围坐身边，大声呼唤他（她）的名字；死后为死者净身，穿寿衣时扣子要向相反方向扣；停丧时死者脸上盖白布或白纸（日本称“天冠”，荆楚地区称“落气纸”或“落气袋”）等等。而最为奇特的，要算办丧事时的欢歌狂舞。

日本古代丧仪中往往伴有歌舞。《古事记》中有段丧事描写：天照大神派往苇原中国的天若日子死后，“天若日子的父亲天津玉神和天若的妻子听到哭声，便降下来，悲伤地哭泣着。在那里搭起灵堂，举办丧事。他们让河雁充当拿饮食的人，让鹭鸶做拿扫帚的人，让翠鸟做司厨，让麻雀做舂米，让野鸡做哭丧女。确定了各自的职司之后，举办了八天八夜的歌舞。”

据《日本书纪》，公元四五三年，允恭天皇驾崩时，新罗贡来十八艘船和八十名各类乐人，“自难波至于京，或哭泣，或歌舞，逐参会于殡宫也”。

《魏志·倭人传》载倭人葬俗：“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后汉书》中也有类似记载。

日本至今有丧葬歌舞活动遗存。据报道，在冲绳津坚岛，有年轻人死去时，“则死者的生前伙伴，每天晚上携带酒肴和乐器到草丛里，每人看一遍死者面孔，便使劲跳舞，以安慰死者的灵魂。”

荆楚地区流行的丧葬歌舞，按表演形式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湖北省长阳、巴东、石首、秭归等县及四川部分地区的“跳丧鼓”，形式是边唱边跳；一类是湖北省秭归、宜昌、公安县等地的“转丧鼓”，由鼓师背鼓于前，歌师们尾随其后围成圈，边转边唱；第三类是湖北来凤、宣恩、咸丰以及荆州、沙市一带的“坐丧鼓”，演唱者围棺（或围桌）而坐，和鼓而歌。⑦

来自屈原故乡——湖北省秭归县的一份调查中说：“老人寿终正寝，总要祭之以祀。丧葬之前，家人为了怀念亡者，这里盛行转丧舞，这是一种原始的，古朴的习俗，歌师和歌手，一边打锣鼓，一边吼唱丧歌，换班围丧者棺木转唱，甚至还有人帮腔，以助热闹之气氛。……”

在日本丧葬风俗中还相信有“引魂之舟”，这种信仰最好的证据之一，是福冈县竹原古坟的彩色壁画。壁画中央绘有马夫，马夫头上是一头腾空的似马非马，似龙非龙的动物。马夫脚下是一条行驶在波涛上的小船。象征着将死者灵魂运载到极乐世界去。

无独有偶，在湖南长沙战国时代楚墓中出土的楚帛画，画面中部是一位妇人，她的上方为一龙一凤，而女子脚下站立的是一“半弯月状物”，萧兵先生指出：它“极可能代表灵魂所乘坐的舟船，应该称为‘魂舟’才是”，并作了令人信服的详细论证。另一幅长沙楚墓中发掘出的“人物御龙帛画”，其中也是一男子站立在龙形的“魂舟”之上。

4、崇拜“太一”神　日本人崇拜“太一”神。他们将皇室祖神天照大神称为“太一”，座落于日本三重县的皇室宗庙伊势神宫，每隔二十年举行一次修神殿的“迁宫祭”，祭场上要立起“太一”的大旗，迁宫用的材料刻上“太一”二字，连在场工作人员都佩上有“太一”字样的帽徽。

“太一”是日本从中国引进的神名，而这个神秘的“太”，乃是荆楚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屈原的“九歌”中，“东皇太一”列为第一篇。据闻一多、郭沫若、马茂元等人的研究，“太一”乃是楚人的至上神，是楚国特祀的尊神。

5、尚左　日本古俗尚左。在婚俗中，入嫁的新娘首先得在灶旁向左转三圈，以表示作为家庭新成员对家神（即灶神）所表示的敬仰。在葬仪中，日本不是送葬者绕棺材向死者告别，而是使棺木向左转三圈，以表示不能说话的死者向送葬者致意。

为了表示"左"的尊贵，甚至从江户时代初期起，新婚妇女皆约定俗成地睡在男子右侧，而将左边——尊贵的一边留给自己的丈夫。死者寿衣也是左向系扣。

尚左也是楚文化的传统。楚国官制和兵制，左司马、右司马、左尹、右尹、左领、右领、左史、右史、左军、右军、左广、右广等，皆以左为大。《左传·桓公八年》载楚伐随，季梁对随侯说："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当时中原各国如齐、鲁等，皆承周人风俗，以右为大，唯楚相反，以左为上。

6、傩　荆楚地区至今保存有古老的"傩"戏。从古文献上看，"傩"在荆楚可谓源远流长。《荆楚岁时记》云："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按《礼记》云：'傩，人所以逐厉鬼也。'"传说颛顼有三子，死后为疫鬼，二子在江中为疟，一子在人们住室中惊吓小儿，故人们以"傩"来逐除之。颛顼亦名高阳，楚人之先祖，故屈原《离骚》开篇即是"帝高阳之苗裔兮"。由此传说观之，"傩"很可能起源于荆楚地区的土著苗蛮部落。

在古代日本，每年的十二月祭上都有追傩仪式。至今，日本传统节日"节分"（每年二月三日），仍以追傩为主要内容。

荆楚信仰与日本相似之处尚有不少，例如拜火，崇拜鸡、蛇、鸟、桃树等等，这里因为篇幅关系。不一一例举。那么，在这些相似的民俗表象之下，隐含着什么样的民俗文化之谜呢？

二　曲折的传承路线

在考察两个以上地区具有相同的民俗时，学界一般有两种答案，即一元发生说与多元发生说。前者认为民俗源于某一地，然后传播到另一地区；后者认为民俗各自源于本地，两地民俗的相同，是由于文化创造时的偶然巧合。然而，当我们审视日本与中国荆楚地区的相似民俗时，却不能简单地以一元论或多元论来加以回答。

在笔者看来，日本古俗与荆楚民俗之相似，至少有下列三个原因：

1、在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人类心理共同性基础上产生的不谋而合。例如，对女巫的崇拜，就盛行于许多原始民族，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是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各自独立产生的。至少，目前还未发现日本古俗与荆楚文化的女巫崇拜之间有直接的关系。

2、二者共同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荆楚地处中国腹地，从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国起，楚文化逐渐向汉文化转化，到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成体系的楚文化就销声匿迹了。"以楚文化为表率的南方文化，终于同北方文化融合，成为水平比它们更高，范围比它们更广的汉文化了"。

"九头鸟"形象的演变，是荆楚民俗变化的一个极好例证。"九头鸟"可以说是楚文化的形象标志，"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民谚，至今仍广泛流传。"九头鸟"的形象，在约成书于战国时楚人之手的《山海经》中，是一个"九首人面鸟身"的神（见《大荒西经》），名叫"九凤"。到魏晋南北朝时，则变成了一只"鬼鸟"。《荆楚岁时记》载：

"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作为民族保护神的九头神鸟，居然变成一只偷小儿和预兆不祥的"鬼鸟"，在自己的家乡受到驱赶，可见楚俗变化之大[14]。

日本也属于汉文化圈，同样一直受着汉文化（包括民俗）的巨大影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有许许多多成果，本文这里不详加引述。总之，如果从汉文化对日本和荆楚文化的影响来看，两地民俗之相似，可以说是同一渊源，两支分流。

3、荆楚地区与日本存在直接的文化交流关系，它们的某些相似民俗，可能出自直接的文化传承。这一点过去少有研究，笔者拟对此进行更为详细的论证。

有关日本的最早文献记载，是中国古籍《山海经》："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山海经》是战国时楚人的著作，可见两地交往之源远流长。以现有资料看，荆楚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交流有两条路线。其中第一条，是经长江口出海与日本进行的直接交流。

日本文化的最根本特点是稻作文化，水稻何时、由何地、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日本学界众说纷纭。根据马兴国同志的介绍：

"多数学者认为，水稻由中国的中部、南部直接传入九州地区。从水稻的品种和产地，以及当时中国的水稻生产水平分析；从现在在日本列岛中部沿海的出土文物来看，水稻由我国的华中、江南，直接渡海传入日本是有道理的。传入时间虽难断定，但从绳文时代结束，弥生时代初期便有稻种存在的痕迹看，可能是在公元前三世纪。"[15]

公元前三世纪，正是楚国鼎盛的末期，而华中地区，当时属于楚国的版图。所以，说日本的稻作文化可能是由荆楚地区传去的，并非臆断。日本著名学者江上波夫曾指出：中国中南部吴、越、闽、地的非汉族土著，长于种稻、航海。由于楚国势力的扩张，这些种稻民族通过海路迁徙到朝鲜西部和南部，以及日本九州北部和本州西端，将稻作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16]。这个论断也是有道理的。

日本还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说法，认为古代携带稻作文化渡海来日的"倭"人，其发祥地是中国的云南地区。约在公元前五百年之前的绳文时代晚期，有一部分倭人顺长江而下，将稻作文化带到了日本[17]。按照这个说法，日本的稻作文化也是经由荆楚地区迁徙去的。因为从长江上游沿江出海，长江中游的荆楚是必经之道，而公元前五百年，正是楚国由上升期转入鼎盛期之际。

据有关研究，早在楚国创立之前，居住在楚地的土著，即是稻作农耕文化[18]。春秋时代楚国立国之后，当地稻作农业有了更大发展。最典型的标志，就是楚庄王时期（公元前613—公元前591年），孙叔敖主持修建的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期思陂。楚人的凿井灌田，畦种等，在当时都是先进的农业技术。更有意思的是"火耕水耨"法，"火耕"即种稻之前烧去田间之草，"水耨"即除去与稻谷同生的野草，沤入水中为肥，这种方法与云南山地的火耕法完全一样。

荆楚与日本同属稻作文化圈，日本稻作文化如果是由荆楚（或途径荆楚）传入的话，那么，一种生产方式的输入必会带去相关的特定民俗，日本、荆楚两地民俗之间的相似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日本学者乌越宪三郎曾指出："不同的生产方式，随之形成不同的独特文化。在这一文化体系中，标志倭族的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说就是稻作农业和干栏式住房吧。[19]在荆楚地区，除以水稻为主食的稻作生产方式与日本一致外，也有与稻作文化相对的干栏式建筑，当

地称之为“吊脚楼”。

在建房习俗中，荆楚地区至今盛行“上梁”仪式。我的家乡鄂东，当新房盖到上好第一根屋梁时，以红布系着屋梁，梁上吊一菀箕，内装糖果、饼子之类，爆竹声中，菀箕徐徐吊上屋梁，木匠在梁上行走，用木锤敲打屋梁，主人向在场的人撒糖果和饼子。根据介绍，日本的“上梁祭”与此仪式几乎完全相同[20]。

日本与荆楚相似的服饰民俗有木屐与草鞋。在人们心目中，木屐几乎是日本文化的象征。然而，在荆楚地区，直到一、二十年前，木屐还十分流行（笔者小时还穿过木屐）。在江汉平原农村，至今能见到穿高跟木屐的人，行走在雨后泥泞的土地上。日本学者在云南山区看到当地在雨季时穿木屐，认为“这种木屐也许是当年他们居住在平地从事水稻栽培时代的遗物”[21]，这个推论是相当精辟的。此外，日本过去流行的“草履”，即草鞋，更是荆楚地区常见之物。

更有趣的是，古代楚人男子多不着裳，只在腰胯间缠一兜裆布，称作“缩裈”。这种习俗在楚地早已绝迹，但在日本，至今相扑士们仍保持着这一古老的服饰习俗。

顺便提一下荆楚地区与日本婚礼中一个有趣的相似风俗。在日本，据说至今仍有将新娘在夫家初夜用过的布挂在屋檐或挑在竹竿上支在门旁的风俗。在鄂东，人们在闹房时，喜欢将洞房的门帘用竹竿挑起来，高高挂在门前树上。这显然是古代炫耀贞节的一种行为，而在荆楚地区虽采取了一种略有变异的形式。作为旁证，在鄂东，新娘婚后第二天往往会去河边洗床单，这时人们常会围观新娘的床单并与他打趣。

荆楚土著文化中的某支沿长江口出海迁移至日本是有可能的。日本学者发现稻作文化在公元前三世纪出现于日本，而秦灭楚正好是公元前223年，这种时间上的巧合意味深长，它使我们联想到这样的可能性：在楚国灭亡时，某支楚人遗族乘船出海，迁徙至日本，将稻作文化及其习俗带到了那里。而进一步扩大视野的话，荆楚文化与东南沿海的吴越文化有密切关系，而东南沿海文化与日本文化同属太平洋文化圈，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能要追溯到更古老的神话时代，这是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除了由长江出海外，荆楚地区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可能还有第二条路线。这条路线比较曲折。

日本民间故事研究者们发现：中日民间故事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现象。例如，关敬吾先生认为：日本民间故事流行的类型大约不下六百个，其中与中国民间故事相同或类似者占一半以上[22]他们进一步经过认真比较，发现日本民间故事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故事更为接近，日本人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更易于理解。这种奇特的现象，理所当然引起人们探索的兴趣，尤其是八十年代日本出现的“云南找根热”，更令不少日本学人相信，日本人的“根”是在中国西南地区，将日本故事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发现的民间故事进行比较，一时成为热点。

然而，中国学者对此却有另外的意见。早在1981年，中国民间故事学家刘守华先生在《略谈中日民间故事的交流》一文就指出：

“我国西南地区地势险峻，交通阻塞，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比中原地区落后，显然不可能直接以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同远隔东洋大海的日本进行民间故事的交流，这种联系必然有更深、更复杂的渊源。”[23] 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认为，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氐、羌本来居住在黄河流域，他们的南迁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带到西南地

区，然后随文化交流而影响到汉族。而刘守华先生则指出：这种状况在古时少数民族居住过的吴、楚地区更为明显。他以亲身调查证实，湖北地区流传的民间故事，有不少与日本、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相同。因此他说："如果只看到已经发掘出来的西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材料，仅就这些不完全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所得的结论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种局限性与片面性。在中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上，如果能够进一步利用长江流域广大汉族地区的材料，注意和影响深远的楚文化联系起来，将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必将获得更有价值的成果 。

为什么湖北的民间故事既与西南少数民族又与日本的民间故事相似呢？何彬女士在《中国西南地区与日本民间故事传播途径浅探》中，提出了三条路线：

"1、湖北等昔日多民族共处过的地区的大量民间故事，可随着文化及生产技术的交流及商业往来，以江南上行由中国大陆北部经朝鲜进入日本；

2、随着大批日本遣唐人员出入长江中下游地区，民间故事也渐渐被带往日本。

3、苗族在向西南地区迁徙过程中把流传在中原地区的各民族共有的故事沿途传播并一直带到了中国的西南山区及东南亚国家。带到西南山区的故事就地流传开被保持至今，带到东南亚国家的故事就可能一方面与东南亚国家相互交流，一方面经海上航路随着东南亚地区与日本的交往而流传到日本。"

以上这些研究，都在日本学者关于日本与中国西南地区之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所透露的最重要信息，是推测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日本的一些民间故事，有可能出自一源，这个源头不在中国西南，而是在华中（主要是荆楚地区）。荆楚→西南→东南亚→日本，就是本文所要提出的第二条荆楚与日本文化交流的路线。

当然，民间故事只是游艺民俗之一，它的传承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民俗，但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俗的传承过程。从上面引述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成果，到本文所列许多荆楚与日本相似的民俗，笔者相信：在古代荆楚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一定有着现在尚未完全为人所知的直接传播关系。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徐楚桥**

---

①③⑥　关敬吾《民俗学》第160、152、162。

②⑤⑩⑫⑮⑳　马兴国《千里同风录》第10、40、132、24、86、135。

④　《古事记》第41。

⑦⑧　《民间文学论文集》第151、241—242。

⑨　萧兵《楚辞与神话》第15页。

⑪⑰⑲　鸟越宪三郎《始于云南之路——探寻倭族之源》第10、13、2、16。

⑬⑱　张正明《楚文化志》第20—21、9。

⑭　见拙文《'九头鸟'的来源与演变》，《艺术与时代》1988年第5期。

⑯　《骑马民族国家》中文版第201页。

㉑　关敬吾《日本民间故事选》中文版寄语。

㉒㉓　《民间文学》1981年第2期。

㉔　见《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2期。